

# 昭君出塞故事的中外文学演绎

李琳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本文将中国昭君故事与日本谣曲《王昭君》、捷克《汉宫里的背叛》作为主要文本考察对象,通过情节模式、悲剧冲突的比较观照,从而展现出不同语境中同一故事类型的文化实践差异,并以此开拓昭君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关键词]** 昭君故事;比较研究;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0)03-0136-06

昭君出塞的史实最早见于班固《汉书》,昭君出塞故事的发展正是源于这一历史事实。《汉书·元帝纪》诏曰:“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sup>[1]</sup>这一事件在《元帝纪》《匈奴传》《王莽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也均有记载。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王昭君的一生:入宫,出塞,为宁胡阏氏并生二子,复为后单于阏氏并生二女,这就是王昭君真实的生命历程。由于昭君的貌美见弃与文人的怀才不遇极为相似,无论是对悲剧氛围的渲染,还是对悲剧原由的追究,历代文人们都是为了突出昭君的“不遇”。正如康熙皇帝在《昭君墓》一诗的序言中所说:“昔有不得志于功名或身遭迁谪,往往托昭君怨而为诗,以写其抑郁。则在当日之怨极而悲,又不知何如。”<sup>[2]</sup>昭君出塞的故事正是因为有了历代文人的情感投入,流传极广,影响极大。这一流传了2000多年的故事成为作家、艺术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它孕育了丰富的艺术作品,有文学,有音乐,有绘画,仅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就构成一道壮丽的文学景观,咏叹昭君的古今诗词达700余首,描写昭君故事的小说、戏剧有200多部,而大多昭君故事都是以“哀怨”为主要基调,这是由于古中国农耕文明的发达使得国人安土重迁之观念根深蒂固,而背井离乡自然就成了人生之大不幸。可以断言“昭君怨”虽未必为历史之真实,却必定是人性之真实,因而必定是最高最美的艺术真实。正是人类情感的可通约性促成了“昭君怨”主题之形成和发展,也促成了昭君故事的中外文学演绎。

昭君故事在古代日本广为流传,日本诗人们咏唱昭君,如9世纪初期日本君臣的昭君母题诗作等。昭君出塞形成各种故事传说,成为日本文学中为人熟知的悲剧故事,如《今昔物语集》王昭君的故事,日本谣曲《王昭君》更是脍炙人口。昭君的故事也流传至西方,19世纪捷克著名的晚期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作家尤利乌斯·泽耶尔(Julius Zeyer, 1841年—1901年)就曾根据昭君故事创作了他的第一篇东方悲剧故事《汉宫里的背叛》。“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取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隔离机制的作用下,用本民族特有的心理机构和审美定势有选择地认同和消化,从而产生出传统性和新颖性相结合起来的文化。”<sup>[3]</sup>昭君故事的传播也同样遵循上述法则。而现代文学批评家认为,一个故事用什么样的语言,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往往比故事本身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此,本文把中国昭君故事与日本昭君故事、捷克《汉宫里的背叛》作为文本考察对象,透过三者情节模式和悲剧冲突的比较研究,尝试开启富有

**[收稿日期]** 2009-12-15

**[作者简介]** 李琳(1975—),女,湖南常德人,副教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民间文学。

意味的文化景观。

## 一、日本昭君故事

中国与日本,具有既广又深的文化因缘,因此王昭君的故事在日本文学中也广为传播。日本《今昔物语集》里就有如下记载:

震旦汉元帝时……胡国有使来朝……朝中贤臣曰:“胡国使者此来,于国极不宜也。若遣此人,宫女甚众,择一丑者相送可也。如此使者欣然而归,此为至善。”天皇闻言以为然……天皇以为可唤画师数人,令其观宫女绘形。天景观像选一丑者,送于胡国……宫女皆惧被遣于遥遥陌生之国,以重金珠宝贿画师……其中有王照君者,姿容超群。王照君自恃貌美,不贿画师。故画师不如实绘貌,气貌劣下。天皇见此以为不美,遂定王照君。天皇略觉蹊跷,召见王照君。见她光彩四射,美如珠玉,妙不可言。其他宫女粪土无异。天皇惊叹不绝,懊恨送夷。数日之后,夷国亦闻此事,入宫相商,此事遂定,不可更改,只得送夷。王照君乘马将行,虽悲悲切切,然无济于事。天皇亦悲恋不已,思念之深,遂往照君居处。春风拂柳,莺鸣空响,秋叶飘落,厚积院中,屋檐无隙。悲怜无过于此,恋情弥深,悲伤之极。彼胡国之人得王照君喜不自胜,弹拨琵琶,吹奏诸乐,行离汉土<sup>[4]</sup>。

“处于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与民族心理的相近,可以不约而同地产生大体相似的情节的故事,但在已有可能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下,不同民族共同采用同一种精巧的情节型式来编织故事,则肯定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只是这种交流的途径很曲折,不易探寻罢了。”<sup>[5]</sup>《今昔物语集》的内容大体与中国《西京杂记》相类,略有不同,故可以认为《今昔物语集》是以《西京杂记》为底本来创作的。《今昔物语集》的昭君故事比《西京杂记》更具悲剧性,这不仅是因为《今昔物语集》的描写更加细致,更重要的是,《今昔物语集》描写了汉元帝对昭君的恋情,而《西京杂记》等作品只写了汉元帝的悔恨。《今昔物语集》对恋情的描写尽管没有展开,但爱情内容的加入使冲突变得更加突出,悲剧性增强了,尽管其中爱情内容的增加似乎有些突兀。

谣曲《王昭君》也取材于中国的昭君出塞历史故事,它与中国原本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很多内容是中国原本中看不到的。作品以昭君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写了昭君的父母白桃与王母。白桃、王母在昭君离开汉宫被遣往匈奴之后,终日以泪洗面,思念昭君。昭君在前往匈奴之前,曾在家门口栽下一株柳树,并说假如她在匈奴死去了,柳树就会枯死,柳叶飘落。白桃、王母见柳树枯死,心中甚为焦虑,便用镜子照柳树。这时镜子中出现昭君的亡魂,随后又出现了呼韩邪单于的身影。呼韩邪单于的形象奇丑无比,如鬼一般。单于自惭形貌丑陋,从镜中遁形隐去。从这一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似乎看不出谣曲《王昭君》与史书之间的直接联系。然而白桃、王母的情节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写白桃、王母的邻居前来探望,并在闲聊中问起昭君为何被送到匈奴。白桃、王母便向邻居讲述了昭君被送给单于的经过。在这一条线索中回忆了昭君的身世。昭君有绝代美貌,进入宫中之后与汉元帝十分恩爱。这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强索美女,汉元帝嫔妃不少,她们个个有倾城之貌,难分伯仲。汉元帝派画师为她们画像,以像之劣下者送与匈奴。昭君因其容貌出众,汉元帝又十分宠爱,就没有贿赂画师,因此她的画像较为丑陋,因而被送给匈奴。汉元帝虽然不愿意把昭君送给匈奴,但因“君无戏言”,只得把昭君送给匈奴。显然,作品对于昭君身世的描述是依据中国史书和笔记小说而写成的,而昭君父母的加入,昭君与父母彼此的思念却使作品更具悲剧色彩。

## 二、捷克《汉宫里的背叛》

捷克著名的晚期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作家尤利乌斯·泽耶尔(Julius Zeyer, 1841年—1901年)是德国文学及其他东方各国文学的热情读者,“泽耶尔作品里有大量东方素材和主题。”1881年,泽耶尔开始

写作“中国风”系列作品,开篇之作是《汉宫里的背叛》。这个短篇故事主要取材于英国汉学家兼外交官德庇时爵士的著作《中国: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的一章及其中国杂记的一篇散文,他还读了其他汉学家的著作或翻译著作。泽耶尔不能阅读任何东方文献,他依赖的是译本,但对主题进行了学术或艺术的演绎。泽耶尔还借重李白和常建(8世纪)题咏王昭君的两首小诗,在自有人物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创造性构想展开,所有对故事的演绎都完全有赖于他创造性的构思:漫漫黄沙中,一群被驱逐者坐在长满松树和阿月浑子树的树阴下,那儿就是“青冢”的所在地,他们在树荫下听说书人讲王昭君的故事。说书人是这样开始的:总督库塔宇受元帝之命,让他寻找一位非常漂亮但却“不值得他看一眼,也无法给他激情”的女子,以献给匈奴呼韩耶。而元帝自身对爱情和美丽的向往,希望用“蝴蝶之选”的方法来寻找后宫最有魅力的女子,然后让她陪他一起品尝和着晨露的美酒,以克服他的坏脾气,同时避免与呼韩耶及其军队的交涉。阴险的库塔宇希望昭君能成为元帝最爱,但同时能为他所利用,以实现他的野心。昭君拒绝了,于是她只能作为礼物送给呼韩耶单于,而元帝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在匈奴呼韩耶单于把美人昭君带到蒙古草原成为他的妻子以前,爱上昭君的元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宝石雕就的湖泊,在它五彩斑斓的浪尖漂浮着一只白色的孤舟。舟里站着一位孤单的少女,少女用悲哀的眼神目送一群白鸟飞去。她正唱着一首忧伤的歌。她的声音正是昭君的声音。白色在中国是死亡的颜色。昭君用自己的梦境来回应元帝,她梦到那艘船航行在黑暗的湖上,两边是茂密的树木,有鸟群在其中哀鸣。其中有一只夜莺唱着忧郁的歌在树间飞来飞去,从树上采了一朵蓝色的花。昭君知道那棵树和那朵花代表的是她,所以她觉得她与元帝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在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蓝花”是纯诗或诗性的美好愿望。在这里,它代表一种纯粹的、浪漫的爱情。通过梦境的分析,我们知道昭君冥想着她的爱人——元帝,他应当作为一只夜莺来到她身旁,折下她化身树上的一枝蓝花。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她知道自己已被抛弃。昭君、元帝和呼韩耶会面的结果,对昭君意味着彻底的绝望,对元帝意味着难以置信的震惊,而对呼韩耶意味着胜利凯旋。昭君认为,这不仅仅是“总督”库塔宇的“背叛”,也是皇帝的过错,他轻信了臣子的谎言。他看着昭君的黑发、高额和悲哀的眼睛,痛悔地说道:“我找到你了。你是我的梦中女郎。我看见你站在宝石海间的小舟上。用这双悲哀的眼睛,你目送一群白鸟飞入沉沉黑夜……”昭君最终成为了匈奴可汗的新娘。她曾耐心等待着命运的召唤。在她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她选择了顺从。元帝对昭君说:“把我的心从胸膛里剖出来,扔到鞑靼人的马蹄之下吧!我绝不放弃你!”而昭君把手放在匈奴可汗——她未来丈夫的剑上,说:“我会随你去那片蛮荒之地。大汗,我将践行元帝所承诺的。”其实那也不是她的选择,作为一个中国女子,她不可能追求她想要的东西。在19世纪西方作家的笔下,昭君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性格单一的深宫中的幽怨女子,而脱胎成为一个有思想的、追求纯粹浪漫爱情的新女性形象,昭君故事成为带有颓废色彩的中式风格作品,但依旧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

### 三、中外昭君故事的比较

#### 1. 情节与细节:文本的异同

由于昭君故事流传久远,种类繁多,限于篇幅,现仅将昭君出塞故事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比较对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日本、捷克三国昭君故事有着相似的情节元素:被选入宫、小人作祟、美而不遇、出塞和亲、香消玉殒。这些元素反映了人类生活境遇和精神心理的相通性。当然,三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细节差异。在小人作祟这一重要细节上,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填补了史书上记载昭君入宫数年不得见御的逻辑空白,增添了画工之事:“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案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後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後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sup>[6]</sup>《西京杂记》所记载的昭君故事成为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版本。由于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日本《今昔物语集》和谣曲《王昭君》延续了画师画像这一细节。谣曲《王昭君》在细节上却有区别,王昭君此时已是深受元帝宠爱的明妃,她自恃美

貌和汉元帝的宠爱,不贿画师,画像最丑,因而落入了被遣匈奴的命运。汉元帝尽管宠幸昭君,但他有言在先,以图形丑好为准决定远嫁匈奴的人选。就因昭君的画像丑陋和“君无戏言”,就决定把昭君远送匈奴,显得不合情理,也与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史实不合。然而作为异国人的想像,如此构造冲突还是可以理解的。捷克的泽耶尔在《汉宫里的背叛》却省略掉了宫廷画师毛延寿的角色——这个向王昭君和后宫女子敲诈勒索、背信弃义的画师。他用另一位重臣库塔宇取而代之,库塔宇有着“鹞心鹰爪”,他的目标则是“瞒上欺下”。他妄想通过控制皇帝最宠爱的女子来控制皇帝,在阴谋没有得逞后,他利用“蝴蝶之选”,对昭君头上的花环浸泡了毒药,蝴蝶落在上面纷纷死亡,昭君没有当选,元帝被告知昭君只不过是一朵“苍白、无色的花”,于是元帝与昭君失之交臂!同时,在昭君的结局上,三者也有一些差异。旧传东汉蔡邕所写《琴操》:“……昭君至单于,心思不乐……昭君乃吞药自杀。”<sup>[7]</sup>唐代无名氏的《王昭君变文》也有同样的结局。昭君到胡地后,终日郁郁寡欢。单于用种种方法以引起昭君的兴致,而昭君最后还是在忧郁中死去。《汉宫秋》以民族矛盾为背景描写了汉元帝同王昭君的悲剧,王昭君被选入宫时因未贿赂画师毛延寿,被点破画图,打入冷宫。后被汉元帝发现,封为明妃,恩宠有加。不料毛延寿畏罪叛国,把她的真像献给匈奴单于。单于遣使赴汉,并以大兵随后,指名索要昭君,朝廷上下束手无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昭君挺身而出,愿和番。昭君北行,在番汉交界处毅然投江自尽。或吞药而死,或抑郁而亡,或投江自尽,都是要其全节而终,这就为昭君形象打上了封建道德观念的烙印。这种结局的安排,虽与史实不符,但丰富了昭君的形象,并且符合古代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符合民族的心理特征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众的理想和愿望。

日本谣曲《王昭君》通过昭君父母回忆,由柳树枯死,写了昭君在匈奴死去,最后昭君的幽灵在镜中出现,白桃、王母得以与昭君团圆。使得昭君父母思念昭君和昭君父母谈到昭君时回忆昭君的悲剧身世两条线索最后重合。白桃、王母思念昭君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和《今昔物语集》中都没有,以这一线索作为基本线索创作整个作品,使得原本没有的亲情内容占有了较大的比重,从而使作品成为亲情的悲剧。通过柳树枯死写昭君的死,这是远古树神崇拜在日本文化中的遗迹。在原始人看来,花草树木也跟人一样有灵魂,有时人们相信死人的灵魂依附在树身上,使树有了生命,从而也必随树而死亡。在日本的自然环境中,日本人接触最多的是树木。他们赞美树木强大的生命力,感激树木给人的恩惠,食物、住房、船只、衣服等几乎都是树木提供原料。对树木的亲感和感情,加之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使日本人对树木产生很深的感情,这一点也表现在日本文学中。日本人自然观的重木情缘在文学中有种种体现。据日本学者统计,《万叶集》写的149种草木中,木就占66种。他们也十分尊重与木相连的其他植物,特别是花。《古今和歌集》到《新古今和歌集》的歌素材,几乎都与植物联系一起。通览这个时代创作的数千首诗歌,就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植物分布情况。一位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谣曲《王昭君》让昭君的靈魂寄托在柳树上,可以看出日本民众对昭君的热爱和深深的同情。而死去昭君的幽灵在镜中出现,白桃、王母得以与昭君团圆这样的结局是同日本小说对神鬼怪异题材的浓厚兴趣分不开的,鲜明地体现出日本文学空寂、幽闲、物哀的总体特点,追求和营造一种冷艳幽异之美。

在泽耶尔的故事里,元帝的梦中女郎被永远带进了匈奴的帐篷。王昭君并没有像马致远剧本和德庇时译本中那样,在属中原的一边自沉黑龙江。她穿过了边境线,开始思念故土,思念那些浓密的森林、金碧辉煌的宫殿和中原地区房子的暖炉。她在她丈夫的金帐里哭泣流泪,她的脸因漫天风沙而憔悴——她忘不了那份爱。她居住在荒野间的匈奴游牧部落里,“缓缓走向死亡,怀念着大河高山之外的黑色森林。她哭泣在鞑靼可汗的深红帐幕里,枯萎在飞沙黄云下。只有温存的黑夜带给她些许安慰。无边无垠的草原上有一座低矮的绿丘,她常常在一群年轻侍女的陪同下前往散步。从那里她眺望着自己祖祖辈辈生息的挚爱的故乡。”元帝的哀痛是无边无际的,但在泽耶尔的版本里,他没有过在梦里见到昭君的机会。他向匈奴可汗送去了一笔巨大的赎金。泽耶尔利用了德礼文侯爵(Le Marquis d'Hervey Saint-Denys)翻译常建的《昭君墓》一诗。他读到的译本是:

留在汉宫,她也不能免除死亡,  
但却能避免这死亡的痛苦,孤独远离故乡。

百驼黄金买不来,这年少多娇;  
如今所余几何,不过枯骨寥寥。

赎金毫无用处,可汗没有接受,汉皇的使臣无功而返。昭君似乎也不愿意回去,虽然她爱着元帝,但比起一个中国式传统的女子,她更像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女子。她意识到元帝把她当做东西一样送给匈奴,这是她无法接受的。昭君最后还是死在了异域他乡,她的匈奴侍女把她抬进可汗的丝绸王帐。得知深爱的明妃过世的消息,元帝离开了宫殿,漫步在山林中,想捕捉昭君的身影,亦或希望在梦中见到她。元帝向匈奴可汗索要昭君的遗体,可遭到可汗更加坚决的拒绝,正是这种切肤之痛成为元帝去世的诱因。“她长眠于此,在这座陵墓,在大漠的中心地带,”说书人这样结束他的故事,“在这里,有风吹过,有月光照亮她归天的路途。天上的云都为她停留片刻,在青冢的上空哭泣。甜蜜的梦啊,你总是伴着一颗垂死的心。”昭君始终爱着元帝,但她又想忠于呼韩耶。所以,她不想回头,而是选择了死亡。《汉宫里的背叛》以一种独具一格的表象、意志和文本形式淋漓尽致地再现了19世纪西方昭君的悲剧命运和一种“颓废美”。

## 2. 悲剧冲突之差异

中、日、捷克三国作家以同样的昭君故事创作悲剧,在构造悲剧冲突时,是通过赋予意义来创作的。三国作品都不断地赋予昭君故事以新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点构造冲突,塑造人物。其中,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典型的政治悲剧。为了把昭君故事写成政治悲剧,《汉宫秋》对历史背景也做了较大的改动。历史上的汉强番弱并不存在多少政治冲突,戏曲作品改写为汉弱番强则构造出了原本没有的冲突,加入了政治冲突,使得王昭君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意义更加突出。以一个弱女子去调和政治冲突正是为历史上很多诗人所耻笑的政治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便是江山社稷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统治核心的具体体现。爱妃被夺,就不仅仅是汉元帝个人家庭的支离破碎,而深深地隐喻着国破家亡、江山改易之含义。身为君主,不能保全姬妾爱妃,无异于不能保全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究其原因,当是政治统治上的惨痛失败。于是昭君和汉元帝的爱情悲剧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是汉民族的悲剧。作品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和作者马致远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活在元代异族的统治之下,被异族奴役和驱使的切肤之痛使他有感于汉民族的衰微而对历史进行了改动。剧中汉王室忍辱屈从,反映了剧烈的民族矛盾,从而作者也抒发自己心中对汉室的想念,寄托自己对汉民族强大的希望。

日本谣曲《王昭君》则是一部亲情悲剧。虽然其中也写了汉弱番强的内容,但仅仅是作为背景来写,不能构成真正的冲突,没有使之发展,因而《王昭君》中没有政治悲剧可言。然《王昭君》具有双重冲突的结构,悲剧的主要冲突并不在于昭君远嫁匈奴的命运冲突,而在于这一冲突引起了昭君父母的思念。这一冲突是以昭君幽灵回归故里进行创作的,显然,白桃、王母的思念和昭君幽灵的回家构成了不可解决的冲突,是真正悲剧性的。《王昭君》的主要线索是由昭君父母思念昭君而不得相见构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以父母与女儿的亲情来创作的,从而显现出冲突的伦理意义。《王昭君》在以亲情为中心的表层之外还有一个层面,那便是形而上的层面,即生与死的对立和断裂来构造整部作品的基本冲突,叙述昭君经历的那一条线索也是作这一线索的前提而存在的。《王昭君》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昭君死亡的悲剧性场面,却以间接的方式写了死亡,而且主要是以此为核心理织内容的。整部作品以两件东西为中心安排结构,一是柳树,一是镜子。昭君父母的思念围绕柳树飞扬,柳枯叶败,水浮乱叶,泪湿衣袖,泪映月影……其中无限的焦虑,不尽的孤独,绵长的哀怜……这里的悲剧体验实际上就是由生与死的冲突构成的,并表现了对生死意义的思考。白桃、王母从柳树的枯死中看到了昭君之死,从柳叶的飘零中体验出人生的无常。人生无常如同尘芥,人之死亦如尘芥,生与死的冲突不可解决,人生的一切都在不断改变。现世中常住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而死本身恰恰是无常。这里表面上写的是对昭君的思念,而实质是对生死不可解决这一冲突的体验。

而捷克《汉宫里的背叛》却是一部爱情的悲剧。作为19世纪的晚期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作家的泽耶尔,可能追随了福楼拜对梦境的描写,也可能敬仰中国道家作者庄子和沈既济所描写的梦境。夹带着各

种对梦的阐释,泽耶尔讲述了昭君与元帝之间的爱情悲剧。作为“汉宫里最珍奇的花朵”却得不到元帝的眷顾,昭君苦闷、忧郁、孤独、绝望。她正期待着,希望被选择成为纯粹、浪漫的爱情中的一方。在她的梦里,她渴望“蓝花”从自己的化身树上被人折下,她渴望皇帝正是自己梦里那个摘下她化身树上“蓝花”的英俊青年,但最终她失望了。如今她被引介给了匈奴可汗,虽然这时第一次看到昭君的元帝认为,她的确是自己能够想象到的“美”最精致的范本,他发狂地爱上了她。但此刻的昭君却决定离开,她的尊严让她选择离开:“元帝,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你把我赠给了他,如同一件物品。多谢你毁灭性的重量。我的忧伤,它给我哭泣的灵魂插上翅膀。”昭君与元帝浪漫唯美的爱情在十九世纪西方颓废主义作家笔下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气息,昭君对美好平等爱情的渴望,她身处匈奴草原中的孤独与忧伤,她的美丽与自尊,她的牺牲精神,都表现得那样动人心弦。在这里泽耶尔运用的是李白的诗《于阗采花》。他读到的也是德礼文的译本:

昔日,于阗女子采花时,  
自言:此花与我们相似;  
但是一天早晨,汉宫的新娘来到西方,  
多少鞑靼美女羞愧自伤。  
她们发现汉朝诸多美女,  
没有鞑靼的鲜花可以比拟。

泽耶尔在他的《汉宫里的背叛》中展现了他心中的天使型的女性形象。颓废主义者常常塑造一些病态而且可怖的女性形象,如红颜祸水、妖艳狠毒的女人。而天使型的女性形象则是承传了浮士德中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女性形象。塑造这样的形象,可能与泽耶尔曾受的天主教教育的影响,以及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重新转向天主教有关。美丽、爱情和死亡以一种理想化的形式置放在一起。爱情的美丽与诗意是瞬间的,孤独才是永恒的,爱情更因为悲剧而绚丽。“荒漠上的风可以卷走那些流浪者的足迹,可岁月的狂风吹不走你的名字——王昭君,不幸的中原女儿,即使是百头骆驼负的万两珠宝黄金也补偿不了你。”正是这种因不被人理解的孤独而产生的悲剧性结局,才使他们的爱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才使得这份情感越发的凄美。

“共同情节的相同性反而能够大大凸显变化部分所暗示的不同价值观与假设。”<sup>[8]</sup>比较昭君故事的中外文学演绎,我们找寻到了昭君的不同命运之旅,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日、捷克三国昭君故事在从历史向悲剧作品的演变之中,都不断地赋予历史素材以新的内容、新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悲剧冲突。内容细节的差异,悲剧冲突的演变,使得三个国家的同一母题作品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悲剧意义。

####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元帝纪(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7.
- [2]康熙帝御制文集[M].台湾:学生书局,1966.1305.
- [3]黄永林.挪亚方舟和努哈方舟[J].外国文学研究,1990,(4).
- [4]汉前帝后王昭君行胡国语第五[A].今昔物语集[C].东京:岩波书店,1960.208—281.
- [5]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01.
- [6]葛洪.西京杂记·王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53.
- [8]培利·诺德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刘凤芯译.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2.284.

(责任编辑 吴铭 责任校对 戴正)